

试水港式医院：为医生松绑

本报深度记者 石念军

日诊500患者

甫一走进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下称“港深医院”)的大厅,就有淡妆的导医指引或讲解预约挂号事宜,情形堪比走进了高档货柜。

对习惯了门厅熙攘的内地患者而言,港深医院是一种陌生的体验。完全遵照港式理念管理运营,强调“以病人为中心”,尊重医生价值。“我们的理念就是让医生在放松的状态下,为病人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港深医院院长邓惠琼对齐鲁晚报记者称。

按照“预约制”的原则,前往该院诊疗,必须提前一天预约。如果病情未知,需预约“全科”;如果病情已知并持有病历,可预约“专科”;因急诊中心尚未开诊,目前尚不接诊临时病患。根据邓惠琼的说法,实行预约制,可以解决内地医院惯有的排队顽疾。门诊大厅的导医同样如此介绍,“因为我们实行的是预约制,就是一天到了8000-10000人,也不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其“预约挂号”的终端平台信息显示,预约时段精确为半小时。

但显然,与内地居民更多随意性的就医习惯相比,这种强制性的预约机制与潜在医患群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并不默契。其门诊量的缓慢增长也借以印证,评价它“水土不服”。

邓惠琼拒绝就舆论认为的“水土不服”予以置评。她说,截至目前的第一季度内,医院日均门诊量约为500人次,高峰期曾超700人,现有住院病人100位左右。与去年7月1日试运营的第一个月接诊总量4300人次的规模相比,门诊量正按院方既定的规划曲线攀升,符合预期目标。

按照她的解释,门诊规模之所以增速缓慢,主要是因为诊室开放数量尚少,规划中的专科门诊尚待陆续开放,“院方不能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大规模接诊病人”。同时,由于相关手术设备也有待进一步完备,很多手术尚无法开展,也限制了病人进门。

对于一家建筑面积超过39万平方米的大医院来说,日均500人次的门诊规模,显然略显萧索。走在港深医院的医技综合楼内,遇到物业与安保人员的几率几乎可以超过病患。甚至好多护士台前,除了护士端坐其中,便无病患可寻。与动辄逾万人次的内地三甲大医院相比,它俨然处于另一种极端。

(上接B03版)

因此,产业集聚区设立了劳动就业办公室。当时,崔振华找到永城市技工学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对报名找工作的人进行定点培训。崔振华说:“我们的培训不是盲目的,而是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培训,全力服务好用工多的企业、最新入驻的企业,开展所需工种和订单式培训,培训完成直接进入厂。”

在不断摸索中,劳动就业办公室把推荐就业与企业用工需求结合,崔振华说:“我们的工作经常到区内企业和村组中调查企业用工、农民就业的供需情况,通过建立企业用工需求台账和劳动力资源台账,实现了企业和劳动力的对接。”

当时东吴纺织服饰、志永达纺织等企业急需招聘纺织工人,劳动就业办公室了解到情况后,围绕失地居民开展缝纫、裁剪等

依林傍海,庭深筑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或许是内地最漂亮的医院。没有熙攘的人群,没有蜿蜒的长队,几乎区别于一切内地三甲大医院的惯有模样,深圳媒体说,它看上去更像一所大学。

作为深圳公立医院改革的标本先锋,以港式理念运作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就像一条被放养此地的“鲇鱼”,从试水的那一刻起就被希冀良多。但在坐拥8家三甲医院、年门诊总量近8000万人次的深圳医疗市场上,这家仅仅运行9个月的医院还远不能撩起些许涟漪。与动辄日均门诊近万人次的其他三甲医院相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日均500人的门诊规模,却难言成功。但正如大学之大在于大师,医院之大又在于什么?或许,只有厘清基本的边界,公立医院改革才能真正向纵深处破冰起航。



3月26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骨科门诊。

医改“鲇鱼”的期待

这所高规格医院,是深圳市按照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综合性非营利性医院。其前身深圳市滨海医院,立项可追溯至2003年,于2007年奠基。深圳方面与香港大学在2009年协议共建,滨海医院未及面世即转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并于去年7月1日开业试运行。

协议双方,深圳市负责投资,迄今已耗资近40亿元;香港大学负责管理运营,聘任原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邓惠琼做院长。开业5年内,深圳市以财政拨款的方式为医院运营“兜底”。

邓惠琼称,深圳方面分别针对员工工资、病患补贴、医院运营杂费等方面,按比例予以补贴。补贴比例逐年递减,5年后医院自负盈亏。但她拒绝透露政府补贴的相关比例和具体额度。

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信息公开数据则显示,其2013年度预算比去年增加303129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支出数以及市人民医院外科大楼、市康宁医院综合楼、市儿童医院住院楼投入使用。”其中,港深医院占公

立医院预算九成。

巨额投资背后,深圳方面图谋几何?根据滨海医院的立项初衷,当年深圳市只有一家三甲医院,筹建滨海医院主要是为了解决白领等当地新兴群体看病难题。至2010年底,深圳市三甲医院数量达到8家,探索公立医院改革的表述成为惯例。

当地人士介绍,北大深圳医院筹建初期,也曾被视为重要改革标本,但一晃多年,已是“混然于众”;平安信托与龙岗区合作共建龙岗中医院,期许远大,却以失败告终;曾头顶深圳首家深港合资医院光环的龙珠医院在巨额负债压力下亦败走麦城。医改样本城头变幻,引进先进理念打造一所范本式医院成为深圳的选择,与深圳一水相隔的港方由是涉水登陆。

医生薪酬 无关看病人数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曾到港深医院调研,他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咨询时认为,就目前来看,港深医院模式并不适合国内绝大多数公立医院,但一些方面可资借鉴,比如对医护人员劳动价值的尊重。据邓惠琼介绍,目前该院已有的160余名医生,均

由她出面一对一签署聘任合同,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薪资和绩效。

“我们的医生不根据看病人的数量获薪。”邓惠琼强调,港深医院的薪资标准一般为同级别内地医院的两倍。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余晖,作为财政部公立医院改革调研组成员之一,在去年下半年也曾到港深医院调研。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他的观点与张雁灵类似,认为摒弃现行“事业编制”的薪资模式,像港深医院一样遵照合同约定取酬,方显对医生价值的尊重。如大学之大在于大师,根据余晖的分析,尊重医生、激发医生的热情,方为医院之大。

“港式管理正是国际惯例。”余晖说,它的核心是赋予医生自由执业空间,尊重医生劳动价值。基于此,医生便可自由流动,通过不断的谈判议价选择执业平台,从而收获自我职业认同并由此激发执业热情。

自内地医院跳槽入职港深医院的一名全科医生认为,国内三甲医院的“旧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生”:不规范的诊疗技术,与劳动强度不匹配的低收入,靠不正当

的收入和社会关系来维系社会地位,遭老百姓抱怨。“医生不收红包、回扣,专注于医学、看病,具有相应的正当的良好收入,受人尊重。”上述全科医生说,虽然进入港深医院半年以来,感觉医院的发展仍存在很多问题,但医院所推崇并执行的这种就医理念,正是理想的模式。

港式而不是港医?

相对病患数量的多寡,港深医院在业内引起的关注,似乎更为密集。其官方网站记载的信息显示,卫生部、财政部、当地省市领导等,在去年下半年都曾密集造访,无不寄语凝重。也有未经当地官方证实的传言称,因港深医院所聘人员中多有当地医生,已有区主管部门禁止医生跳槽入职港深医院。

根据测算数据,开业5年后,港深医院日均门诊量可达8000-10000人次,2000张病床满员,医院可实现收支平衡。邓惠琼表示有信心实现这一目标。尽管在外界看来,在已经拥有8家三甲医院的深圳,港深医院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完全系于未知。包括曾经参与项目论证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内的业内人士,也表示有待观察。

曾经前往调研的余晖同样表示了忧虑,在他看来,即便是作为医改试点样本,地方政府是否有必要在医疗资源并不紧缺的情况下,耗费巨资举办如此规模的高端医院,仍值得思考。

尤其是考虑到其现有的300张特需病床的高比例VIP服务规模,余晖担心它会沦为与普通民众无关的“贵族医院”。廖新波对此也有担忧,认为以40%的特需服务“养活”60%的非营利性门诊,“世界独有”。

在港深医院看来,重要的是理念的落地,而不是“港医”的到来。显然,对于那些曾经密集造访的调研队伍而言,这也是他们对港深医院落地深圳的最终期许。事实上,已经有不少曾经前往港深医院就医的深圳居民表示失望。很多人奔着“港医”的名声而去,到了才发现接诊者仍是内地医生。邓惠琼在受访时坦言,目前已经有160名“港医”与港深医院签约,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和培训。

在深圳年逾8000万人次的医疗市场上,运营9个月仅有6万人次接诊规模的港深医院,还只是一条完全谈不上话语权的“小鱼”。至于能否扮演“鲇鱼”,尚需看它在2017年卸下深圳政府这副“拐棍”之后,是否仍能从容起舞。

职业技能培训,最终向企业输送了500多名工人。

截至目前,永城市产业集聚区劳动就业办公室已为企业免费培训工人4000余人,输送工人5000余人,进行在册劳务登记的逾万人。

■失地农民农转非 “享受城镇保障” 却遭遇房价高涨

老宅子被拆迁前,谢树发并没想到脱离土地后,自己竟然从农民变成了“城里人”,现在还能再去当环卫工人。由于家门口就有企业,侯国玉在外打工的儿子也回到了永城,成了产业集聚区内一家设备制造厂的工人。

按照永城市实施的安置政策,姚坤鹏介绍说,失地农民农

转非后,享受城镇居民各项生活保障,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办理城镇医疗保障,纳入城镇医疗保障体系,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民申请办理城市低保。

据了解,在保障这些新“城里人”的生活方面,永城市提出了“规划在先,安置在先,依法在先,让利在先”的工作思路,同时依靠社会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劳动就业保障、群众就医保障等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系统来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

目前,全国各个地方对城镇化的表述,河南是最独特的,是“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城镇化,包含了农村的城镇化。

然而,侯国玉在满足当前“红火小日子”的同时,最近心里又开始打起小鼓,“眼瞅着儿子快到了结婚的年龄,但指望还租没租出去的门面房和儿子每月1800多块钱的工资,为儿子买婚

房确实比较难……”

3月24日,趁着孩子周末休假,老侯一家人骑着电动车,沿着产业集聚区到市中心的芒碭路,逐家打听新建的商品房价格。

在产业集聚区与市中心的交界处一个名为“中豫世纪城”的高层楼盘,销售人员告诉老侯:“现在均价是每平方米4100块钱,不过将来可能还要涨……”

逛了一天楼盘下来,老侯之前那种当上“城里人”的优越感仿佛突然消失了,回到家后一个人在楼下抽着烟,闷闷不乐。

“为了发展,我们这代人搬迁,从农民变成了城里人,政府又给补偿,生活确实改善了。”老侯说,“但是,我们的下一代也成了城里人,没有了宅基地,家里一共就存着拆迁补偿款那些钱,虽然是享受城镇

保障却又遭遇房价高涨,年轻人咋办?买不起房,这不和大城市一样么?”

随着城区迅速扩张,永城的房地产火爆一时,财富开始在房地产间流转。在新城,一片片的高层商品房正在建设,房价已由2009年的每平方米不足2000元涨至现在的4000多元。

然而,永城市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408元,农民年人均现金纯收入则仅为7432元。

对此,曾经在当地政府从事党政工作的张殿卿老人非常担忧。他告诉记者,房价短时间内翻番,只能导致居民在购房支出方面压力增大,房地产市场存在很大风险。当地政府急需对房地产市场加强宏观调控,避免新发展起来的城镇重走大城市的坎坷之路。